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回应巴亚特

文/Tariq Ali (英国)

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ûn) 在《历史绪论》的引言中这样写道：“王朝和政府如同世界的集市，同时吸引着学者和匠人的作品。”这位14世纪的学者，以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研究和对之前几个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作品的批评为基础，建立了新的理解历史的方法论。用“华盛顿”或是“国际社会”替换“王朝和政府”以及他接下来所写的内容，对于现代而言毫无违和感：

善变的智慧与被遗忘的学问在那里出现。这个市场里讲述着各种故事，提供着各种历史信息的商品。无论什么东西在这个市场中抢手了，在其他任何地方也都抢手。如今，每当建立的王朝试图避免不公、偏见、弱点和两面派，决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永不背离，其市场上的物品就如同白银一样纯净，黄金一样美妙。如果它受到了私利和敌对的影响，或是受到了暴虐、狡诈的小贩摆布，集市上的物品就变成了废铜烂铁。明智的批评者必须在环顾四周时自己作出判断，检查这个，欣赏那个，选择另一个。^[1]

在2011年春爆发的起义过去两年之际，环顾阿拉伯世界，我们应该如何对其结果——埃及和突尼斯混乱的政治景象，也门的暗流涌动，利比亚的武装无政府状态，叙利亚的内战，黎巴嫩的政府危机，巴林的镇压，利雅得和卡塔尔在该地区分量的上升——作出评判？从阿拉伯的当下能

够识别出任何模型吗？阿塞夫·巴亚特 (Asef Bayat) 的“艰难时代的革命”是一份深刻的初编资产负债表。^[2]在广阔的比较性、历史性框架下，巴亚特对反对性策略进行了分类：改革式、暴动式、改革式革命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个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年代：金融危机加剧了面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飞速上升时自由民主制的破产和政府可问责性的缺失，这导致的政治僵局看上去需要经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加之早先革命流派——反殖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失败葬送了革命的可能性，“手段”和“远见”都是缺失的。在他看来，结果就是，埃及和突尼斯反独裁者采取了“改革式革命”的策略：大众动员的目标在于迫使政权改革自身而不是推翻政权。只有当不愿妥协的政权用武力作出回应时——例如利比亚和叙利亚——“改革式革命者”才被迫发动彻底的暴动（在北约支持下），用暴力推翻政权。

巴亚特从冷战斗士蒂莫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处借用了“改革式革命”一词，阿什创造这一词汇是为了描述1989年春季在波兰和匈牙利上演的自由化进程。不过，巴亚特承认，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进程目标并不在于当时中欧的谈判所带来的那种根本的经济转型。他认为，在这种意义上，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

革命或是2004至2005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虽然这两者缺乏解放广场为埃及全社会注入的解放动力。巴亚特借用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漫长的革命”这一概念作为总结，将之作为“重大民主变革”的可能战略。应该如何评估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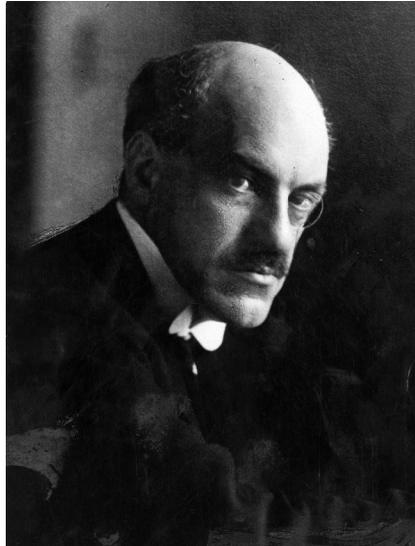
术语

巴亚特不仅正确地强调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些政权，既缺乏手段，也缺乏远见，还强调了埃及、也门和突尼斯所释放出的暴动能量的广度和深度。借用“改革式革命”这一新词是否有助于把握现实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一词语最初指的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进程。加顿·阿什曾对国家和反对派代表之间在布达佩斯和华沙进行的协商赞不绝口，称“开明的”共产党官员正在组织一场“史无前例的撤退”，提出分享权力，为通往议会民主之路做准备，呼喊“充实你自己”。（就连加顿·阿什本人也承认，共产党大佬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的前景，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3]除了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东欧的动员规模相对较小；1989年春舒适的闲谈距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身着制服的发言人电视直播的通告和解放广场上疯狂的人群相去甚远。

“改革式革命”也未涉及2011年

伟大的战斗口号：“人民想要政权垮台！”（而不是改革。）这一混合了策略——任何坚决的、有效的政治运动，其策略必然是灵活的——和目标的术语显然是要冒风险的。不过，开罗、苏伊士和亚历山大群众的口号和精神是清晰的：不只是穆巴拉克必须要下台，他手下的酷刑者——包括邪恶的奥马尔·苏莱曼，奥巴马政府一度将他标榜为穆巴拉克的继承人——和残酷统治这个国家数十年的内务部，也必须下台。军队本身并未成为目标，尽管自1973年的失败后就仰赖美国资助的最高指挥部扮演着腐败而通敌的角色。虽然2011年2月时青年军官、士兵与群众已结下了情谊，但抗议的领导人决定克制着不去分裂军队，这可能是对于势力对比的战略性误算所致，而不是出于对穆巴拉克的国家机器抱有幻想。巴亚特的“改革式革命”如果有所指的话，更适用于南美的玻利维亚共和国——这一模式遭到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坚决拒绝，而且悲剧的是，没有受到多少青年军官的支持。

巴亚特的术语并没有太好地捕捉到阿拉伯反抗的社会内容和政治经济学内容。在这方面，和1989年的中欧的类比彻底失败了。作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对立物的经互会国家，本质上是社会专政性质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深度城市化，拥有大规模的工业部门以及社会、教育和文化供应品，让多数公民获益——正如陶马什（G. M. Tamás）所提到的。^[4]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官僚集团中的领导派别渐渐地被市场的妙策所吸引。一旦与亲资本主义反对派的协议达成，削减开支和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就摧毁了现存的社



一战时英国内阁中的犹太阁员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贝尔福宣言》。

会结构，与西方公司的竞争以大批本土产业的倒闭结束。相比之下，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在阿拉伯国家向来有限得多，工人也从未像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同行那样受到补贴。乡村的贫困根深蒂固，大量的贫民窟围绕着大城市，青年的失业率高得令人绝望。在萨达特统治下，埃及解散了有限的福利国家制度，开始了私有化的计划。社会保障微不足道，主要只包括食品和燃油补贴。穷人能够获得的医疗和教育大部分都由清真寺——巴亚特所说的“搭便车者”——提供。众所周知的是，新自由主义令政权的亲信得利。社会骚乱与罢工常常遭到镇压，但它们从未彻底消失。如何表述政治和经济要求依然是抗议运动的一大关键性战略问题。

遗失的维度

同样重要的是，巴亚特所划分的政治领域——改革、革命，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物——排除了任何对更广阔的参与其中的势力对比的分析。如果说阿拉伯起义是作为本土对腐败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nd, 1917.

Dear Lord Rothschild,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u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贝尔福宣言》承诺，英国内阁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的警察国家和社会贫困的反抗开始的，随着西方列强和周边邻国介入斗争，起义迅速国际化了。巴亚特希望在欧洲历史中找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类比物，为此，他低估了西方帝国主义贯穿该地区的具体影响力。目前阿拉伯国家的边界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划下的，并且包含了英国内阁——其中唯一的犹太阁员表示反对——保证帮助欧洲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宣言，由此开启了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清理场地而剥夺和驱逐大批本土巴勒斯坦人的进程。如果不考虑该地区最为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势力——美国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能恰当地对如今阿拉伯世界的各种结果作出分析；考虑到美国的以色列游说者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巴以问题，就不可能恰当地对美国的作用作出评估。

在冷战时期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独裁国家纷纷解体这么长时间之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政权还能够存在如此长的时间，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相互缠绕的两股逻

辑：华盛顿心存戒备地守护着该地区的石油；以色列控制着美国的中东政策。自由选举会带来伊斯兰主义者上台这一风险，他们可能将亲巴勒斯坦的言语付诸行动。在高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时，阿拉伯世界的例外主义性质在阿尔及利亚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之春在1988年就开始了。在一周的群众抗议之后，民族解放阵线（FLN）当局同意举行首次地方议会选举，并于1990年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此时美国正因第一次海湾战争大幅扩充军备在该地区点燃了人民的怒火。最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救世阵线（FIS）在全国议会选举的首轮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在选举前不久领导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活动。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建议下，阿尔及利亚军方取消了第二轮选举。一场血腥而堕落的内战接踵而至，僵持不下的战争双方都犯下了许多罪行，愤懑的群众却退回到了消极状态。对死亡人数的保守估计在10万到20万之间，对此西方并没有发出一丝抗议之声。阿尔及利亚迄今还未从这一苦难中复苏。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上台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权都是——悲剧地——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加以部分改动建立的：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吹捧时任总统的荒唐的个人崇拜，以及一个垄断政治与信息的政权。苏联的崩溃令这些“终身总统”成为了原版的糟糕复制品。当他们在年度阿拉伯峰会上合影时，流亡中的伊拉克诗人穆扎法尔·纳瓦卜（Muzaffar al-Nawab）辛辣地讽刺他们就如同拉力赛上的一堆老爷车。

与此同时，穆哈巴拉特（秘密警察）峰会处理的则是更为严肃的事情：与摩萨德勾结、交换对异见人士的意见、争夺北约国家遣返的受害者，以及偶尔在描述折磨受害者的效果时放声大笑。无论是穆哈巴拉特的首领，还是其美国和欧洲的资助人，都没有发觉将至的暴动规模有多大。

干预

当起义于2011年爆发时，惊讶的华盛顿与巴黎第一反应是保卫自己的附庸。萨科齐的外交部长米谢勒·阿里奥—马里希望她的朋友本·阿里能够坚持住，法国伞兵部队正在调集过程中，以保卫本·阿里政权。然而为时已晚，这位突尼斯寡头已经搭上了开往沙特阿拉伯的飞机。在数百人死去之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保全穆巴拉克面子的努力，但在像埃及这样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华盛顿握有其他的潜在工具。与军队最高指挥部的紧急对话已经展开，美国的关键要求之一是要对方承诺新统治者将遵守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这一条约剥夺了埃及对毗邻以色列的一整块

领土的主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夺取权力的首份声明即表示同意支持这一条约。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将被证明是一个粗糙而笨拙的工具，但华盛顿的当务之急得到了保证。

在解放广场之后，本土抗议活动再也不具备令人惊讶这一优势，帝国势力——以及地区邻国——在塑造起义结果方面占据了上风。巴亚特将“石油”与“残酷性”列为西方军事干预的理由，但并没有解释为何北约对不同国家的处理是高度选择性的。对华盛顿而言，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性是根据分为几个等级的利益考量来决定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与以色列的接近程度、石油与财富、地理位置、人口分量、敌友状态。作为该地区地缘战略上的关键国家，埃及自1973年以来就是紧靠美国的“朋友”，在获得的军事援助数量上仅次于以色列。贫穷的也门则被当作沙特阿拉伯的附庸，美国会让萨利赫尽可能长时间地掌权。只是当军队分裂、炸弹对住所的袭击导致这位暴君受重伤后，华盛顿才将他送到了利雅得，并组建了一个妥协性的全国政府，而萨利赫的人马依旧各安其位。



巴林的起义遭到了镇压。

其存在就得益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各君主国一直受到不同的待遇：在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海湾国家，腐败的王朝依然是生活与政治的最高仲裁者。在这些被称作“稳定的支柱”的国家里，西方价值——个人自由、人权、不歧视女性和少数群体——受到了比在任何“流氓国家”更为公然和更令人震惊的藐视，对此白宫几乎没有发出不赞成的声音。在巴林，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显然准许了沙特阿拉伯进行武装干预，从而将这一冲突变得宗派化——引发这场起义的青年曾呼喊道：“既不是什叶派，也不是逊尼派，我们是巴林人！”——并镇压了反抗者。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利雅得和卡塔尔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采取了攻势。在白宫和以色列的默许下，半岛电视台成为了将阿拉伯之春的军事化宣传为由个人敌意、宗派仇恨以及与伊朗之间凶残的敌对所决定的扩音器。

华盛顿一直更为冷峻地看待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共和国。利比亚在地缘战略或人口分量上都不太重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比亚与海湾国家更为相似：人口稀少、外籍劳工众多，经济完全由石油租金决定。的黎波里之所以成为华盛顿的敌人，完全是由于卡扎菲的言辞，不过中央情报局继续借鉴他的经验来迫害伊斯兰主义者。在2003年放弃了部分原始的核设施后，他被正式视作了朋友，并加入了西方的反恐战争，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机构将利比亚异见人士移交给了他。但与穆巴拉克、本·阿里不同——他们是依附于华盛顿或巴黎的纯粹的官僚——卡扎菲是不可预测的。他可以在一个月中变得暴力和怀恨在心，也

可以在下个月对这些伤害过他的人作出让步。卡扎菲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不断装腔作势的欲望所决定以及搅乱的。他能够用最极端的自我欺骗和幻想将自己提升到原先从不具备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高度。在他与西方修好之后，西方顾问说服他许诺推行自由市场，满足石油巨头的欲望，并将利比亚尚未开发的海岸线向全球旅游业开放。卡扎菲虽然表示了同意，但仍闪烁其词，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出钱与西方搞好关系：他资助了萨科齐的竞选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款待了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吹捧道，《绿宝书》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提出了这一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此话倒也并非完全不对。

卡扎菲的罪行以及更为严重的弱点——不愿意建立适当的社会基础设施，由此消除了部落的忠诚，以及对伊斯兰主义异见人士的残酷镇压——在2011年2月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周得到了充分展现。但一旦他明白西方准备放弃自己，他就做好了谈判的准备。^[5]卡扎菲决定屠杀自己人民的这则军事—人道主义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以半岛电视台的一篇关于利比亚空军正在扫射示威者的报道为基础的。根据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的国会证词，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同时，当政府军重新夺回米苏拉塔、扎维耶和艾季达比耶时，也并未发生任何屠杀。卡扎菲于3月17日明确地向班加西的叛军发出了“毫不留情”的警告，但对于放下武器的人却提出了赦免，并开放了埃及边界处的逃亡通道。卡扎菲的政权固然残暴，但如果说北约的轰炸是在“阻止种族灭绝”、防止出现“另一个卢旺

达”，或是如奥巴马所言，“如果我们再多等一天，班加西将遭遇震动该地区并玷污世界良心的屠杀”，^[6]证据并不充分。在北约空袭开始前，死亡人数少于1000人；据最保守的估计，在为期6个月的轰炸期间死亡人数在8000至10000人之间，北约的飞机不是在“保护平民”，而是在尽其所能地搜寻并打击卡扎菲的军队。

战争之后的利比亚支离破碎、全副武装，掌权者则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垄断着暴力，远远超出了2012年7月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的控制（据说卡塔尔资助了两大主要政党）。^[7]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及其中央情报局附属建筑在2012年9月遭到了利比亚民兵的袭击，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身亡。^[8]与此同时，尽管作出了“透明治理”的声明，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未来依然被遮蔽在秘密之中。利比亚石油占全世界石油储备的3.5%，如果国家石油公司被私有化的话，绝对不会缺少买家。

叙利亚的尾声

具有更大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叙利亚是由复兴党执政的警察国家，在该地区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多年来既支持着黎巴嫩的真主党并庇护着哈马斯领导层，实际上又对以色列占领本国西南部表示顺从，并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伊拉克。在某些方面，叙利亚证明自己要比该地区其他国家更难以被同化进美国领导的秩序之中：它并没有像土耳其和约旦那样寻求与以色列和西方合作，其主权也未像埃及那样受到削弱。在冷战结束二十年之后，大马士革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行动空间尽管缩小了，但依然存在。伊朗是叙



巴沙尔试图模仿其父亲强硬的专制作风。

利亚反对沙特阿拉伯、争夺黎巴嫩的支持者。如果说巴沙尔的政权比卡扎菲要更加理性，那么对处于多数地位的逊尼派可能报复一直以来居掌权地位的处于少数的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的恐惧心理限制了其可能采取的措施。

数月以来，抗议一直是和平的，与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并无二致的是，运动的强度与日俱增。然而，初期对于起义的规模以及显然的民意将迫使政权谈判的希望——要求是选举出将起草新宪法的议会——从未实现。有证据显示政权中有少数派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路径，然而试图模仿其父亲强硬专制作风的巴沙尔相信，任何让步都会是致命的。2011年夏叙利亚自由军在土耳其训练营的建立、沙特阿拉伯表明愿意推翻复兴党政权（对于沙特国王“没有什么比失去叙利亚更能削弱伊朗”的观点，以色列也深有同感，他们还希望打垮真主党），以及在中央情报局监督下，利雅得和卡塔尔经约旦对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武器和资金支援，都更加坚定了叙利亚政权的观点——这是一场外部势力支持下的逊尼派的进攻，并增强了它用武力方式捍卫自己的决心。^[9]

和在利比亚一样，奥巴马政府是在“从后方领导”，将《纽约时报》所称的“如潮的武器”提供给自己青睐的团体，并像在伊拉克那样，迫使反对派碰头以建立起半傀儡政府，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正在杀戮阿拉伯人。反对巴沙尔并不必然导致呼吁西方干预，而一旦北约加入，不管谁最终取胜，人民都将失败。2011年8月29日叙利亚地方协调委员会的声明明确地回应了这些问题。一个强加的过渡政府、遮羞布般草草了事的选举，以及一位空降成为过渡政府新总理的德州叙利亚人，是不会解决贫穷的农业小镇的社会惨状的——而这正是此次抗议运动的基础。^[10]即使在这一阶段，协商达成的方案仍将是摆脱巴沙尔及其亲信的最好途径。但似乎木已成舟，帝国希望这一政权垮台。

掌权的伊斯兰主义者

1991年的阿尔及利亚与2011年之后的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差异在于，华盛顿谨慎地准许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政府的潜在成员，不过是处在军队和内务部的阴影之下。巴亚特将

这些势力描述为“后伊斯兰主义者”，目标在于建立虔诚的社会和世俗的国家。这一说法对于现实政治是含糊其辞的。这方面的模板是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华盛顿紧密的军事联系，对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达成了事实上的秘密协定。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或是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政府拟定资产负债表或许还为时尚早，但它们迄今为止的作为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一旦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将穆巴拉克赶下了台，美国关于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对话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穆斯林兄弟会的首要理论家海拉特·沙特尔 (Khairat Al-Shater) 不断保证，他希望进一步“深化”埃及与华盛顿的战略关系，将遵守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的条约，并履行向以色列提供带补贴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协议。^[11]

然而，当2012年6月竞选举行时，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还是成功地找到了一名旧制度的候选人——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并保证他能够获得足够高的得票率，从而让美国国务院至少能有所选择：如果他们无法与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达成协议，他们还可以选择沙菲克，军方随后则会平定一切抗议。2012年6月24日，在选举结束一周之后，紧张的局势缓和了。华盛顿为穆尔西的胜利开了绿灯，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穆斯林兄弟会的胜选。在首次向白宫示好的访问中，穆尔西表示：

奥巴马总统一直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要说他的行为真的是和他的意图相一致的。我们一同就加沙的停火协议进行了讨论，这非常重要，然后

我们就可以谈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双方都在谈论分歧，我们希望他们能谈论相似之处……我们现在正在尽可能地做这项工作。^[12]

这项工作包括巡查加沙地带的边界，以及关闭那些作为被封锁在加沙地带内的200万人民唯一经济命脉的地道。穆尔西发誓将于2012年9月将其封闭。埃及军方已开始将污水灌入这些地道。^[13]

在突尼斯2011年10月的选举结束十八个月之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及其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正在挣扎着巩固自己对于国家的控制。宪政局势依然处于动荡之中，新草案尚未正式生效。经济正在恶化，失业率高达17%，通货膨胀加剧，尽管表示要将发展的方向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南方，但贫困的内地并无多大改善。仍在协商中的2012年的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包括削减燃油补贴和提高增值税。停滞的局面，加之马里和叙利亚的武装斗争，有助于加强萨拉菲派民兵的势力，他们正在将目标对准突尼斯总工会——在2011年1月动员起来反对本·阿里政权之前，这一机构曾与之勾结数年。2013年2月，突尼斯最受欢迎的左翼领导人肖克里·贝莱德遇刺身亡——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否认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引发了葬礼时的群众抗议和街头对峙，导致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秘书长、突尼斯总理哈马迪·贾巴利辞职。他曾向群众提出组建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全国政府，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将退出，直到通过新的宪法和举行新的选举——这一计划得到了总工会、军队、雇主协会、西方和阿尔及利亚使馆官员的支持。但加努希用更加强硬的伊斯兰主义者



突尼斯受欢迎的左翼领导人肖克里·贝莱德遇刺身亡，引发了其葬礼时的群众抗议和街头对峙。

阿里·拉哈耶德取代了贾巴利。这场危机引发了与世俗左派的大规模公共争论，世俗左派认为，尽管言语温和，但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真实目标在于建立专制的宗派主义 (confessional) 政权，并通过镇压和谋杀将其世俗对手边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内部的确存在着倾向这一路线的派别，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加努希比穆尔西更加精明 (这一点不难做到)，据说他本人更加青睐土耳其模式。就他而言，这意味着疏远巴黎、接近华盛顿。

漫长的革命？

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全盛时期，纳赛尔能够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抵抗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并通过转而请求苏联帮助兴建阿斯旺水坝来回应西方施加的经济压力。当时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实际上是与西方帝国主义一致的。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三次刺杀纳赛尔的尝试，这也导致了该组织被禁、其领导人被逮捕，以及其最具天赋、最古怪的理论家库特布

令人遗憾地被处决。在冷战期间，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主义团体通过多种渠道——其中之一是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接受美国的资助来组织其支持者，对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当时美国政治学教科书中提到这些组织时，口吻是相当友好的。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都陷入了与穆斯林兄弟会争夺阿拉伯世界霸权的斗争。我们也许不喜欢这一点，但这一回合获胜的确是穆斯林兄弟会。

但他们的胜利果实被延后了，因为与此同时恰逢以色列镇压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及华盛顿的军事部署深入欧亚大陆中部，在穆斯林土地上切割出了一块从地中海东部到喀布尔的弧形的战争区域，激发了不可避免的政治怒火。然而，安卡拉的“后伊斯兰主义”——似乎在开罗也是这样——甚至连这一点也可以接受。遭到阿拉伯国家遗弃的巴勒斯坦人不仅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同样如此。结果，《奥斯陆协议》要比爱德华·萨义德所描述的“巴勒斯坦人的

凡尔赛”还要糟糕。尽管建立一个班图斯坦式的小国的方案仍然在谈判桌上，但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及其秘密警察的共谋下，任何公平的两国方案都被遗弃了；作为回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僚变得富裕，人民则在他们的注视下受苦。最好抛弃这样的幻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非供应那些能够被绕着转并被展示为“好的巴勒斯坦人”的显贵要人的以色列国防军的附属物。最好承认今天的冷酷现实，宣布巴勒斯坦人是单一的双民族国家里的无权利公民。

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在阿拉伯之春的醉人时刻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希望远远没有实现。强制机器依然完好无损，而且，穆尔西和加努希的政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社会民主制的缓和药方，甚至还要在西方压力下进一步削减食物和燃油补贴。穆斯林兄弟会承诺的“社会公正”依然是刻意模糊不清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热切地追逐着外国投资者：沙特尔让一家部分所有权属于穆巴拉克一个儿子的银行为他安排与西方金融家的会面，其他的穆斯林兄弟会要人则赞扬了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政策。^[14]这两个伊斯

兰主义政党都明白，是阿拉伯起义使得他们有了胜选的可能，而他们只是在已经胜券在握时才加入其中。推翻两个总统的能力赋予了群众以内部力量，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并未消散，并实实在在地阻碍着政府过快或过分地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两国动荡的教训之一是，如果没有自下而上创立的政治工具或是新的机构，那么人民就会投票给那些看上去是最好的选项。对于穆巴拉克政权，穆斯林兄弟会既勾结，又抵抗；既接受了胡萝卜，也接受了大棒。对于后者的记忆令他们得以掌权，但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应对作为2011年大爆发之基础的深重的社会危机。

巴亚特对今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可能和可取的方式进行了更为普遍化的评论，以此作为反思阿拉伯之春初步结果的结论。引人注目的是，他进一步将“改革式革命”——“为巩固选举制民主创造更好的环境”——与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漫长的革命”这一概念的阐述联系起来。正如他所言，这是“对于革命的另一理解”，但并非是要将改革式革命的实践奉为通往下一个政治成果的更佳路径。对

于威廉斯而言，正由于革命所展望的转型的范围和深度，其过程将是漫长的，其完成甚至将更加漫长。但它并非像改良主义者和现代折衷派所提议的那样是渐进主义的。他写道：“漫长的革命取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条件一定是一场短暂的革命。”^[15]或早或晚，但其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斯认为，漫长的革命这一概念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提供了一种抵抗“降低期望”——将范围限定在取得普选权、一定的生活水平、一定的义务教育年限上——的方式，“降低期望”本身就是对真正的民主、工业及文化进步的严重阻碍；它还对如何衡量发展的实际条件提出了建议，并要求我们发现和反击那些不断试图遏止或限制任何进步的势力——“权力和资本、分散精力与虚假情报的可命名的代理者”。^[16]像巴亚特提议的那样与这些势力达成和解，是不可行的。■

(相关简介: Tariq Ali, 巴基斯坦裔作家、政治活动家。本文及《艰难时代的革命》一文首发于英国《新左派评论》2013年3/4月刊(第80期),《新左派评论》杂志及作者授权本刊在中国翻译发表。)

注释

[1] Ibn Khaldū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Princeton 1967, pp. 23–24.

[2] Asef Bayat, ‘Revolutions in Bad Times’, *NLR* 80, Mar–Apr 2013.

[3] Timothy Garton Ash, ‘Re/olution, the Springtime of Two Nation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June 1989.

[4] ‘Words from Budapest’, *NLR* 80, Mar–Apr 2013.

[5] 在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通过数小时后，卡扎菲提出了决议所要求的停火方案；自信能够得到西方支持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刻拒绝了这一方案。此后奥巴马提出了进一步的条件，直到无条件投降。卡扎菲随后提出的三份停火方案(4月、5月和6月)也都遭到了拒绝。

[6] Hugh Roberts, ‘Who Said Gaddafi Had to Go?’, *LRR*, 17 November 2011.

[7] Patrick Haimzadeh, ‘Libya’s Unquiet Election’,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2012.

[8]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的前情妇葆拉·布罗德韦尔所言，中央情报局将民兵组织成员作为囚犯关押在附属建筑物内，并将这次袭击视作解放这些人的尝试。她说道：“对于彼得雷乌斯而言，挑战在于，他的新职位不允许他与媒体交流。他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他们与中央情报局在利比亚的站长有过通信往来。在24小时内，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中央情报局断然否认了布罗德韦尔的设法。见Max Fisher, ‘Why did Paula Broadwell think the CIA had taken prisoners in Benghazi?’, *Washington Post World Views blog*, 12 November 2012.

[9] C. J. Chivers and Eric Schmitt, ‘Arms Airlift to Syria Rebels Expands, with Aid from CIA’, *NYT*, 24 March 2013. 沙特国王的观点见John Hannah, ‘Responding to Syria: The King’s Statement, the President’s Hesitation’, *Foreign Policy blog*, 9 August 2011. 引用自Tugal, ‘Democratic Janissaries? Turkey’s Role in the Arab Spring’, *nlr* 76, Jul–Aug 2013, pp. 16–17.

[10] 关于出任过渡政府总理的Ghassan Hitto,见Franklin Lamb, ‘A Draft—Dodging, Zionist Friendly, Rightwing Texan Islamist to Lead Syria?’, *CounterPunch*, 22–24 March 2013.

[11] ‘Khairat Al-Shater to Al-Ahram: We Are Not at War with Anyone’, *Al-Ahram*, 29 January 2012; 还可见‘Khairat Al-Shater: The Brother Who Would Run Egypt’, *Wall Street Journal*, 23 June 2012.

[12] ‘We’re Learning How to Be Free’, *Time*, 28 November 2012.

[13] ‘To Block Gaza Tunnels, Egypt Lets Sewage Flow’, *NYT*, 20 February 2013.

[14] Avi Asher-Schapiro, ‘The GOP Brotherhood of Egypt’, *Salon.com*, 24 January 2012.

[15]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1979, pp. 420–421.

[1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1961, pp. 12–13; *Towards 2000*, London 1983, p. 268.